

论明代科举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叶楚炎

基于明代科举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强大统摄力，“科举”在通俗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情节结构方面，科举制度成为了小说情节可以依附的构架，在科举制度的规划下形成一些重要的“情节单元”，如“三年”、“发榜”就人物形象而言，对于“监生”形象的探讨，可以透视科举制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身份转化为小说中性格标志的动态过程；而由于现实制度的影响，小说中的科举观念也产生了变异，“舞弊”在小说中的演变正体现了这一点。总之，明代科举的历史图景进入小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在此过程中，小说“个体化”的倾向正是一个异常关键的因素。

明代科举承接前代而来，但在制度的完整和严密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达到了鼎盛的状态。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对于士人心理的影响：“科举制在明代士人心中已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士人进入国学或地方学校接受教育，其终极目标是取科举，求出身，并借此跻身仕途。”^①由于科举在明代的显赫地位，影响对象已不仅是士人，而是将社会各个阶层都包括在内，几乎成为统摄一切的客观存在。何怀宏曾提出一个“选举社会”的概念，“用它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②，由于科举无所不在的统摄力，以及围绕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整个明代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科举社会”。与此相应，由于“科举”在通俗小说^③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也便产生了一种“科举小说”，这不是以题材或体裁进行划分，而是将小说视为“科举”制度以及文化的独特载体。从狭义上说，只有涉及到科举情状的小说才能称之为“科举小说”，而从广义上说，产生于“科举社会”情境中的小说都可以归入此类。

因此，本文以制度层面的“科举”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到科举作为“文化”的特质，注意“科举”作为几乎统摄一切的社会存在，关注其在明代的政治、风俗、心态等方面的巨大效力。而在具体的操作中，则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小说文本的内部，分析科举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叙事、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在影响，以此探讨明代科举对于小说的实际作用。

一、科举程式与小说结构

正是因为明代科举制度体系的高度完备,小说作者在其统摄力的影响下,才会频繁地将科举制度纳入小说。而在以乡试与会试为基本框架的科举制度的规划下,小说渐渐形成了几个固定的“情节单元”,它们的连缀就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小说,科举制度也便由此成为小说情节可以依附的构架。这一部分便着眼于科举制度与小说的这种内在关联,探讨小说里相关“情节单元”中的两个:“三年”和“发榜”,并以之考究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

洪武十七年的《科举程式》有云:“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④,生员期盼着乡试的到来,举人盘算着会试的时间,对于每一个科举中人来说,三年,都是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周期。倘若按照这样的眼光,会发现在小说中,“三年大比”同样留下了颇为醒目的痕迹。以《莽书生强图鸳侣》为例,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清晰地交待了“三年”这一情节时间。就小说的结构而言,“三年”又不仅是情节时间,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时间的间隔把小说划分成为两段。以“三年”为界限,《莽书生强图鸳侣》的主要情节可以分成前篇和后篇。在前篇里,莫可因生病误过试期,却在扬州遇见紫英,并使得紫英与自己私奔。在后篇里,莫可中了进士,解救了受自己连累的仆人来元,在拜见紫英父亲时却受到责骂。由此可以将这两篇小说抽象为“三年——三年”,“三年”既是科举考试的周期,也成为小说情节的自然间隔。关于这一点,在《跨天虹》卷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小说中的陆士善因在吉安做了五年幕宾,再待两年,参加了乡试,却因为交白卷而落榜。陆士善决定再尝试一次,谁知三年后依旧名落孙山。这以后,陆士善在陕西督学陈国柱家做馆师,与陈公子朝夕谈诗论文,不觉又过了三年。由于陈国柱调往福州任知府,陆士善随之前往,又在当地改名入学,终于得中乡试。可以看出,除了一开始的“五年幕宾”之外,这篇小说基本上可以按照三年的时间界限进行情节的划分,而其内部都可以是一个颇具容积的情节单元。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揣想,小说作者实际上是以“三年”为构架来结构情节,整篇小说便是由若干个这样的情节单元拼接而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三年”只是因为科举制度而设立的一个时间标尺,小说在涉及科举考试时,以三年为时间跨度,自然不足为奇。但在陆士善任馆师,没有与科举考试发生关联时,却仍然以“三秋”来标识时间,也正体现了三年这一科举周期向小说情节周期的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每一个“三年”都可以成为一个情节单元,但在实际写作中,这些情节单元的分量彼此之间却并不平衡。《莽书生强图鸳侣》的主要情节多发生在前一个“三年”里;《跨天虹》卷三则更是如此,其第一、第三和最后一个“三年”的叙述都较为细致,而第二个“三年”却只以“光阴迅速,不觉又是秋闱”^⑤草草带过。这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个“三年”都具有展开情节的潜质,但这种潜质究竟能发挥到多大程度,还需看作者的安排和情节的内在要求。就叙事节奏而言,“三年”可以无限拉长,也可以转瞬即过,这也给作者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可是事实上,倘若作者能够充分运用每一个“三年”的内在潜力,则小说便会呈现出另外的景象。

在《女才子书》的《王琰》一篇中,苏敏(字颖生)一共参加了四次乡试,呈现出由四个“三年”的情节单元组成小说的基本构架。而在每一个单元里,均有一段重要情节发生:其一,苏敏中乡试副榜,并娶同邑王长卿之女王琰为妻;其二,苏敏再赴乡试,途中娶碧桃为妾;其三,苏敏第三次乡试下第,却得知其妾碧桃已生一子;其四,苏敏乡试又遭摈斥,郁郁成病,至家三日而殁,王琰与碧桃立志守节。可以看到,不仅小说可以依据三年乡试的日期划分成整齐的四段,并且几乎所有最为重要的情节都紧随着乡试发生。这应当是作者在以科举周期作为小说

情节周期的同时,有意地强调两者之间的关联和转化,既是在显现日常时间的科举意义,也是在着意渲染科举事件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就此而言,与《王琰》一篇相类的还有《醉醒石》中《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这篇小说里的苏秀才也经历了四次乡试,前三次都以下第告终,而每次下第后,发生的故事都不相同。依据“三年”的划分,整篇小说同样可以抽象为四个“三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作者还不断点示“三年”在小说中的独特意义。如苏秀才第一次下第,其自我安慰时便道“只迟得我三年”。第二次落榜,苏秀才叹道:“再做三年不着”,莫氏怒道:“人生有几个三年!这穷怎的了!”第三次乡试不中,苏秀才劝其妻道:“你也相守了十余年了,怎这三年不耐一耐?”莫氏道:“为你守了十来年,也好饶我了。三年三年,哄了几个三年,我还来听你!”当苏秀才中举后,已经改嫁的莫氏心中道:“巧巧九年不中,偏中在二年^⑥里边。九年苦过,三年不宁耐一宁耐!”^⑦在这些人物的独白或对话里,“三年”作为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其中透露出的意味则是,之所以会造成苏秀才与莫氏的婚姻悲剧,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两人的品行或道德方面的缺失,而是由于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对他们的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的折磨。因此,在科举中人的意识里,“三年”所蕴藏的含义,便绝非其他的时间周期可以比拟,所谓“况且读书的,那个不晓得三年最难得过”^⑧。从这一角度出发,正是由于“三年大比”自身的科举属性及其对于科举中人的独特意义,经过从科举时间到情节时间的转化,“三年”作为小说情节的自然间隔,更多的不是出自小说作者的刻意安排,而是产生于科举制度中的小说的一种必然。“三年”固然是难熬的等待,然而一旦名登金榜,再多的付出似乎也都是值得的。正是因为“榜上有名”对于科举中人的整个人生有如此非同一般的魔力,发榜的那一刻,才显得那么重要。作为数十年乃至数十年寒窗之苦的终极寄托,发榜成为了所有希望与失望、富贵与贫贱、得志与落魄、显达与沉沦等人生状态交汇的临界点,所有的梦想都有可能在此时实现,所有的情绪也都可能在此时爆发。在小说所描绘的发榜情形中,“报录”是一个异常重要的环节,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坐在寓所静静等待报录之人前来通知他们中式的信息。关于报录,《客座赘语》中曾这样说道:“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应会试,揭晓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时无人走报故也。”^⑨据此看来,则至少在正德年间,“走报”还未形成一种风气,但在小说中,这种已通过会试或乡试,却无人“走报”的事情却绝少发生。之所以会如此,便是因为报录之人在报知士子中式之时,往往能获得一定的赏金。

在《风流悟》的《百花庵双尼私获隼,孤注汉得子更成名》里,中了解元的张广家中打进一伙报人来,居然索要高达两千两银子的赏金。一次“报录”的收入能达到数千两银子之多,其中不排除小说作者在有意夸张,但哪怕少到只有数十两或十数两银子,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除了要求赏金,士人中举后,报录时还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风气:“报信的人会用棍将其房屋的厅堂窗户都打烂,工匠跟在后面,立即修缮一新,叫‘改换门庭’。这些工匠便永为主顾。”^⑩在《情梦析》里,有人前来报知吴子刚中举:“忽见前厅五六个人,棒头棍子赶入,门外一人喊道:‘不要打!’厅上已打碎了几件家伙。”^⑪可以看到,由于报录、讨赏钱、“改换门庭”等风习的存在,对于中举、中进士的士人来说,从默默地静候到人声鼎沸的喧闹,整个发榜过程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感,仿佛忽然从地面被抛向云间,周围的一切都那么炫目,但所有的物事又都是那样不真实。而更增加了这种虚幻效果的,是报录的时间。例如《山水情》里写及卫旭霞等人候榜时便说道:“挨到谯楼鼓绝、鸡鸣报晓的时候,朦朦胧胧正欲睡去,只听得街坊上人声喧沸。旭霞侧耳听着,停过刻余,忽然敲门打户起来。这时节沉睡之人都惊醒了。”^⑫

由此可见,小说中报录的时间多在凌晨,即便是最为功名心切的士子本人,为等候发榜熬了一夜下来,这时也不禁睡意难当。而报录偏偏便在此时发生,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不知是梦

里,是醒里”之类的意识迷离。与乍梦还醒间的将信将疑这一难言感受相应的是,在“发榜”这个情节单元中,即便中式,小说人物的情绪状态也并不总是单纯的欣喜。由于发榜是所有人生状态交汇的临界点,小说中的发榜便也会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沈灿若去应乡试,发榜前却做了一梦,梦见一个道人只有“荆妻亡故,功名方始称心”,并因此“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正当此时“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锣声不绝,扯住讨赏,报灿若中了第三名经魁”^⑬。在“恩爱”、“功名”不能两全的前提下,本是人生至乐的“金榜题名”,却成为某种灾难的预示,在“发榜”中似乎蕴藏了更复杂的寓意。

对于以科举考试为本务的科举中人来说,中举、中进士,应是他们人生的高潮,而“发榜”则是其中最为华彩的篇章。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华彩篇章在小说中却总显得有些成色不足:首先是一系列近于“恶俗”的报录程序使得这出喜剧流向了闹剧;其次是乍梦还醒间的迷离为这一科场成功笼上了恍惚和朦胧的薄纱;此外还有拥挤在登榜喜悦中不合时宜的另类情感。所有的一切,共同将“发榜”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中。但事实上,境地尴尬的可能不是“发榜”,而是叙述“发榜”的人。就时间跨度而言,“发榜”自然不能和“三年”这样的情节单元相提并论,其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场面或一种固定的情境。但就是这样一个持续时间不过几个时辰的场面,却成为了可以容纳众多情节,并对之进行细致描述的“情节单元”,小说作者的特殊关注以及别样寄托应当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

就大多数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来看,如果乡试的考试资格也能算是一种科名的话,那入乡场已是他们所获得的最高科举荣誉。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所描述的中式者“发榜”时的状况,显然多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这样的描述而言,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并不关键——至少作者可以从其他中式者的发榜中描摹到足够真实的景况,相对说来,渗透在描述中的异样情感对于这一景况所造成的影响更值得重视。不妨揣想一下当其他士子中举、中进士时,作为科举失意者的小说作者的心理:失望、愤恨、怨怼、悲叹、羡慕、嫉妒,有时可能也不免产生一些倘若中举那人便是自己之类的换位玄想,在种种情绪的干扰下,他们眼中的“发榜”情景即便“真实”,也必定会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看到的景况大不相同。从这一点出发,再来反观小说中“发榜”时的诸多状况,便可以从模糊和混乱中理出一些头绪:对于报录时恶俗程序的渲染多少有些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意味;乍梦还醒间的迷离本于雾里看花的不真切;而登榜喜悦中的另类情感与其说是源于中式者的命运巧合,不如说是小说作者在登榜之人身上的灵魂附体。

正是由于以上所论及的原因,与“三年”适合结构比较曲折的情节相比,“发榜”这一情节单元更长于描摹场面,尤其是叙述复杂情感的纠葛,在“金榜题名”的狂喜这一基本元素的映衬下,似乎所有的情感表达都变得轻而易举;由于作者自身的寄托,即便没有其他情感因素的加入,仅仅是素笔的简单描绘,“发榜”时的情景也能成为绝好的图景。

二、科举影响下的人物形象

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某些人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本的社会身份之外,因为科举的需要,他们又多了一层科举身份,如生员以及举人;另一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他们的身份却因为科举制度而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如监生和吏员。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只因科举而存在或因科举而发生意义转变的诸种身份会成为这些人最为醒目的标志,甚至比其原本的社会身份更具代表性。而一旦进入小说,这些身份往往又被类型

化,成为某种性格的标志。通俗小说中的“监生”形象,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对于监生形象的探讨,可以透视科举制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身份转化为小说中性格标志的动态过程,由此探究明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内在作用。

说到“监生”,便不得不提及“援例入监”的制度。所谓“援例入监”是指通过纳粟、纳马、纳银等方式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援例入监制度的实行,使得国子监人数激增,而国子监以及监生的水准和声誉却随之大幅度下降,便如当时南北两京的民谣所云:“国子监里听讲,武定门外炮响,是这等演武修文,只费朝廷粮赏。”^⑩由于援例入监制度的实行,监生的数量大增,对于仕途造成了严重的壅滞,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地方上的普通生员。更为重要的是,援例监生能进入国子监所依赖的不是他们的才学或者资历,而是他们的金钱,因而也就更易招致普通生员的不满,对家境本就贫寒的士子来说尤其如此。在通俗小说中,绝大多数的监生被塑造成了不学无术的典型,除此之外,贪财好色等几乎所有在小说中常见的负面性格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找到对应,如《三言》中的赵昂、赫大卿,《二拍》里的潘姓富翁、甄廷诏等等皆是如此。比之在科举制度以及现实社会中地位与之相仿的其他人物形象,例如举人,监生承载了更多的斥责与嘲讽,这些监生形象似乎正呼应了当时监生的现实情状。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体现了各种负面性格的监生,在小说中却也同时存在着一个形象极为正面的监生系列:《三言》里的鲁学曾、马德称、张廷秀,《型世言》里的秦凤仪、《欢喜冤家》中的费人龙等,都因为各自的学识优长、人材出众而受到作者的褒奖。事实上,正是因为明代所实行的“援例入监”制度,小说中才会出现在性格上迥然相异的两类监生形象。

小说中凭借钱财入监的纳粟监生自然是作者斥责与嘲讽的对象,而其他监生也多有一个“富人”的潜在身份。于是在《剿闾小说》中便有“既是监生,必然大富”^⑪之语。由此可见,在时人的眼中,“监生”必然是富人。因此即使这些人物不是纳粟出身,但由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的监生身份,会极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凭借钱财进入太学的纳粟监生,这也应当是作者有意造成的一种关联。因而,富人监生也不会小说中受到优待。就这一意义而言,虽然纳粟监生在现实生活中被“士子叱为异类”,并且“居家则官长凌忽之,与齐民不甚别矣”^⑫,但其他监生却并不在“异类”之中。可在小说里,由于纳粟监生的存在,富人监生也受到牵连,这种“异类”便有了不分出身,将所有监生笼罩在其中的意味。因此,监生——而不仅是纳粟监生,便成为了小说中倍受歧视的独特一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作者的斥责与嘲讽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纳粟监生的愤恨,但上面所提到那些形象极为正面的监生也多是援例的方式进入太学:张廷秀、马德称、秦凤仪、费人龙皆是纳粟监生。同是援例入监,这两类纳粟监生在小说中有完全不同的刻画与评价,这似乎又推翻了上面的推测。事实上,这正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时的矛盾之处。在《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⑬这里所说援例入监的“几般便宜”,对于小说家来说,也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正是由于“监生”在科举考试方面具有一般士人所不能企及的便利,他们才会让笔下的人物成为纳粟监生,通过这“几般便宜”来完成情节的构筑。

在《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张廷秀欲图参加当年的乡试,但他不是生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援例入监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纳粟监生的身份使得张廷秀顺利通过乡试,并联捷成为进士。《费人龙避难逢豪恶》中的费人龙也是如此,他为了躲避仇家而逃到京城,本想入试,却因为是湖州府德清县的秀才,不可能合法地在京城应试。而在此情形下,援例入监也便成为了他解决难题的惟一手段。援例入监更为关键的情节构筑作用则发生在秦凤仪的身上。《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中,秦凤仪:“随父在京做个上林苑监付,便做京官子弟,

纳了监在北京。后边丁忧回家,定了个梅氏,尚未做亲。及至服满,又值乡试。”^⑧秦凤仪本是湖广嘉鱼人氏,若在本籍应考,乡试尚可,会试却在南卷中,自然不如去北京乡试来得便当。又由于他是监生,因此可以去京城应乡试,正因为如此,秦凤仪动身前去京城。而他“不乱坐怀终友托”的关键性情节就发生在去北京应乡试的路途中。

这则故事的本事出自《南村辍耕录》卷四的“不乱附妾”,原本的情节设置是“维杨秦君昭妙年游京师”^⑨,故事在女子送到以后便告结束,并不牵涉纳粟入监以及进京乡试的情节。而小说作者加入纳粟以及乡试的情节之后,不仅为秦凤仪的入京找寻到了更为自然的理由,也为下面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因为秦凤仪在进京途中显示出的出众德行,他在乡、会试中的联捷便有宿命的意味,由于参加考试,秦凤仪受到所护送之妾的丈夫窦主事的指点,与其交情愈发深厚,而也正因为这一交情,秦凤仪才能在日后险恶的宦途上保住官位。可以说,科举考试成为了此篇小说中所有情节的粘合剂,而“援例入监”又是这一粘合剂中最为关键的原料。倘若没有“援例入监”这一方式,整篇小说相对于本事而言,从简单故事到成熟话本的飞跃便也无从谈起了。

由此可见,虽然因为钱财造成的不平等以及仕途的壅滞,小说的作者对于援例入监和纳粟监生颇多愤恨,但由于监生的种种便利,援例入监却又成为结构小说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作者来说,这便使得他们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中: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考虑,出于对援例入监的愤恨,监生尤其是纳粟监生理应承担更多的斥责与嘲讽,但为了更好地构筑情节,作者又不得不通过援例入监让他们笔下的正面人物成为纳粟监生。这种两难的境地体现在小说中,便形成了上面所谈到形象或正面或负面的两类监生:前者显现的是作者在情节构筑上的努力,后者则渗透了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真实用意。换言之,这两类监生分别对应了在情节上作者对于援例入监制度的依赖,以及创作心理上作者对于纳粟监生的愤恨。而从根本上说,这一两难境地的产生与小说作者的双重身份有关:作为科举中人,他们理应对妨碍他们进身的援例入监愤恨不已;但身为小说作者,他们又会天然地偏好于用援例入监解决结构上的难题。

三、变异的科举观念

在通俗小说中,基于科举制度的现实状况,一些概念往往会在制度与观念层面产生纠缠,这既显露了小说作者在这些問題上的理想,也体现了他们迫于现实对科举理想的改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小说的独特体式,作者的主观意愿,以及接受者的可能要求等种种因素的复杂纠葛,使得小说中的科举观念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独特景观。而在其中,与“舞弊”相关的种种情状应该算是最为独特的。据郭培贵所论:“明代科举制度空前完备,统治者对防范和惩治作弊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付出切实的努力,虽大致保证了有明一代科举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但仍不能杜绝作弊,且愈至后期愈为严重。”^⑩“舞弊”对于科举公平与公正原则的侵害显而易见,对于试图在正当的程序和规则中凭借自己才能通过考试的考生的伤害也不论可知,正因为如此,在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的揭露和抨击俯拾皆是。

在各种舞弊手段中,最为普遍,也最为简单的,无疑是怀挟。例如在《生销剪》之《有缘结蚁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里,贾慕怀的大儿子在乡试中,“做了怀挟,察院打了三十,枷死在贡院门前”^⑪。可以注意到,通过“怀挟”舞弊的考生,在小说中不仅不是正面人物,也多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此而言,以这样的反面小人物来实践最为普遍、简单,同时也最令人不屑的“怀挟”,并让他们出乖露丑,无疑是出自小说作者的特意安排。与“怀挟”相比,另一种舞弊方式

“夤缘”的难度便要大得多了。在“夤缘”中,钱财具有重要的作用。《钝秀才一朝交泰》中,“黄胜夤缘贿赂,买中了秋榜”^②,云“贿赂”、曰“买”,所显露出的意思不言而喻。除了钱财,“官势”是夤缘中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在《玉娇梨》之中,杨芳“文章学问难对人言”,但赖其父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倒中了江西乡试”^③。

事实上,除去可以独立完成的“怀挟”不谈,其余的舞弊方式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等,无不需钱财或是官势的支持。就此意义而言,虽然科举制度标榜平等,但出身富贵的考生原本就在教育基础、社会资源方面优势明显,比贫寒子弟更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而即便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有财势背景者也占据了上风,这便使得无钱无势的科举中人在整个或明或暗的竞争中都处于劣势。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的批判,往往极易转移到对于支持舞弊行为实行的“财势”——尤其是“钱财”的指责上。如《女开科传》中便写道:“然而在那下第的朋友,也不要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埋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④可以看到,“财势”特别是“钱财”分担了小说中对于“舞弊”行为批判的大部分火力,“舞弊”甚至于在指责中被淡忘。而事实上,在指责中被淡忘的“舞弊”,却以另一种方式被读者牢记。

在《人中画》的《风流配》中,会试时司马玄激于义愤,将自己做好的文字送给吕柯,成就了吕柯的一番科名与姻缘。就这一行为的实质而言,自然是舞弊无疑,但在小说中,却成为作者赞扬的“义举”。从这一角度着眼,会发现“小说”中的舞弊,并不只是作者捉弄反面小人物的方式,或是愤激与指责的对象,反倒常常会与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发生关联,并成为这些人物得到科名的利器。不仅如此,这种发生在正面人物身上的“舞弊”现象还往往以多种方式在各级考试中连续出现。如《五更风》之《鸚鵡媒》中的水朝宗,乡试是由于知道一个关节而中式,会试前则又预先知道了考题,因此顺利通过。倘若算上他是因为冒籍而成为秀才,则水朝宗成秀才、中举人、进士都是因为舞弊,并且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看到,小说中正面人物的舞弊,并不是因为其自身才学不足,这些人多可算是饱学之士。但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们却仍需藉助舞弊手段方能中式,这可以初步归结于科举中人日常的才学与考场的发挥往往并不一致。在小说中便说道:“我又只见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你就此时低声和气,老爷、阿伯去求告东房西号,要他掂拨一两个字,只有讨吃许多没趣,谁肯来怜悯帮衬你。”在此处还有一处眉批道:“说到十分苦恼处,那个不潸然泪下。”可见小说中所说的应当是较为普遍的科场情形。而正因为进了科场,便发挥不出平素所学,科举中人才“都要思量一个捷径的法儿”^⑤。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小说中正面宣扬的舞弊现象颇为常见。对于“舞弊”,小说人物也并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偶一为之,而是屡试不爽,并且成为他们获得功名的关键因素。这与小说中对于舞弊的抨击与批判似乎大有抵牾。但事实上,据前所论,对于“舞弊”的愤恨往往被支持舞弊行为的“财势”吸引走,“舞弊”本身倒因此显得有些无辜,在此基础上,“舞弊”便得以进一步成为正面人物手中的科场利器,用来在财势横行的科举黑暗中斩劈出一条科名之路。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所言:“就如唐时以诗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多没有,止有王摩诘一人有科第,又还亏得岐王帮衬,把郁轮袍打了九公主关节,才夺得解头。若不会夤缘钻刺,也是不稳的。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⑥即便是才如“万世推尊”的“诗祖”,倘若不“舞弊”,也成不了进士,这不啻是对小说中正面人物“舞弊”行为的最好开脱。而《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所写的李君一连十科不中,最后用钱打通关节方才中第,也正是上

面这一段话的绝佳注脚。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论作者如何为笔下人物的舞弊行为寻找借口,“舞弊”都破坏了科举考试所标榜的公平、公正原则,对于作者自己所提倡的“阴鹭”也是一种冲击。对此,小说作者则另有一番解释,如《鸳鸯针》有云:

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这句,俨然有个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里面。如那不当中举之年,妄求非福,机事不密,一旦败露,名实俱丧。那时,要依旧还他一个秀才,也不可。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②

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即使舞弊,也要看机缘。如果不是好机会,则不能执意妄行。其二,“舞弊”有一条底线,即“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可事实上,“舞弊”便已经是在“不可求”中求“可求”,而由于各级考试录取名额有限,成就自己功名的同时,也就势必要损害别人的功名。因此,这段话看似是在劝戒“舞弊”,可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为“舞弊”开脱的说辞。在这里,可以将“舞弊”与小说中经常宣扬的“阴鹭”联系到一处,二者都可以视为科举中人掌控自己命运的一种尝试,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常与“神怪”之事相连的“阴鹭”多少有些虚无缥缈,而“舞弊”则显得更为实际。可倘若细心追寻,会发现即便在“舞弊”中仍然有类似“阴鹭”般虚幻的因子。例如《石点头》之《感恩鬼三古传题旨》中仰邻瞻依靠的是鬼魂传递的关节,水朝宗的两番中式则多亏了他的鸚鵡,在这些情节中,“舞弊”多不是有迹可寻的确凿过程,而是海市蜃楼般的奇境异景。这也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找寻到原因,如前所论,大多数“舞弊”都需要“财势”的支持,但科场中兴风作浪的“财势”尤其是“钱财”,却是小说作者着力抨击的对象。这也便决定了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可以通过“舞弊”的方式获得科名,但舞弊却不能经由“钱财”来完成。

正由于小说作者对于“钱财”的愤恨,小说中的人物不会借助钱财舞弊中式,而其他的现实手段又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支撑起舞弊的行为,因此,以仙术梦示、机缘巧合、鬼魂鸚鵡等种种无稽的方式进行舞弊才会在小说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不仅是现实中破坏了公平原则的“舞弊”,成为了小说里贫寒士子扬眉吐气的希冀,本来属于写实层面的“舞弊”也变得如同“阴鹭”一般虚幻,小说中有关科举的情节便在这样的现实与虚幻的变奏过程中充满了印象派图画式的变异之美。

四、结语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明代科举的历史图景如何进入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小说“个体化”的倾向是一个异常关键的因素。所谓“个体化”倾向主要是指小说中的“科举”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吏的程序,其重要性只体现在“科举”对于小说人物自身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小说中对于科举的态度、感受、理解、表达以及期望等等,都从“个体”而来。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更为注重个体对于科举的感受和认知,这种感知纯粹出于自我,与立足于“群体”共通的心态,并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和历史意识的思致往往有所区别。

小说中的“个体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最明显的便在于对于获得“科名”的方式上。正如本文谈到的“舞弊”所论,小说一面津津乐道于“舞弊”及其带来的各种利益,一面宣称自己仍然遵

从一定的道德操守,正是对于自己有悖社会普遍准则行为的一种道德完善,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放弃对于“群体”道德的坚持。而“个体化”正是这一现象的根源。小说对于“监生”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倘若不做细致的区分,就正面与负面的景况而言,小说中的监生形象与现实中大致相同:既有品行纯良、好学睿智的科甲之人,也有居心险恶、不学无术的市侩无赖。但仔细剖析这些监生形象形成的原因,便会发现“个体化”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科甲中人”是因为个体的小说作者结构情节的需要;“市侩无赖”则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于监生这一群体的反感和厌恶。倘若离开了作者“个体”的情绪和表达,小说中的“监生”便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状态。

“个体化”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与“科举”关联形式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虽然总体上说都是科场失意之人,但小说作者彼此之间的科场经历仍有不同,从自己的科举经历出发,按照各人对于科举制度的不同理解和感受,小说作者营造出了众多的科举情状。这些科举情状与“士风”、“气运”、“国运”等宏观层面的视角绝少有关联,多只代表了小说作者一己的认知。这或许也是源于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还没有成为体现集体意识以及精英思想的“载道”的工具,因而可以充分地展现作为私人化著述的特质。

- ①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 ②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 ③ 由于明代小说自身的特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于某种制度的反映有一定的滞后性、稳定性和因袭性的特点,本文所探讨的小说是指明中期(以嘉靖初年为界)至清初(以康熙二十二年为界)的通俗小说。
- ④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3页。
- ⑤ 鹭林斗山学者《跨天虹》,《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藏清初刊本,第27页。
- ⑥ 书中为“二年”,但据文意以及后半句的三年,此处应为“三年”。
- ⑦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藏原傅惜华藏覆刻本,第530、534、539、552页。
- ⑧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 ⑨ 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8页。
- ⑩ 龚笃清《冯梦龙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 ⑪ 安阳酒民《情梦析》,《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康熙中嘯月轩刊本,第191—192页。
- ⑫ 《山水情》,《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东京大学藏本,第226页。
- ⑬⑭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50页,第405—406页。
- ⑮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页。
- ⑯ 懒道人《剿闹小说》,《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本,第143页。
- 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5页。
- ⑱⑲ 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03页,第250页。
- ⑳ 陆人龙《型世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1页。
- ㉑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页。
- ㉒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
- ㉓ 《生绡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 ㉔ 黄秋散人《玉娇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 ㉕⑲ 岐山左臣《女开科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清名山聚刊本,第77页,第96—97页。
- ㉖ 华阳散人《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山木